

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受降权的军事战略与战术实践

徐方甜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围绕受降权展开激烈争夺。面对美蒋联合压制与苏联政策摇摆的复杂局势,中共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为核心:军事上通过两个月光复195座城市、控制胶济与津浦铁路等交通动脉;政治上以军事斗争配合重庆谈判,促成《双十协定》签订;战略布局上以东北根据地为重点,通过土地改革与军工整合构建支撑体系。同时,中共创新运用法理宣示、伪军策反、交通破袭等战术,打破国民党对受降权的垄断。这些举措不仅扭转了军事被动局面,也为解放战争奠定了战略基础。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受降权;军事战略;战术实践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25)06-0032-11

“接受敌国战败投降,是战胜国政府、人民和军队的当然权利”^[1]。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重要成员,理当全面主导对日受降事宜。然而,美国通过盟军一号命令将受降权独家授予国民党,蒋介石随即以“就地驻防待命”命令排斥中共参与受降,使中共陷入法理否定、军事压制与地缘封锁的三重危机。国民党试图凭借国际支持与军事优势垄断受降成果,维系其一党独裁;中共则以全民族抗战主力的身份,争取合理的受降权利,力求实现民主建国。这一争夺不仅关乎抗战胜利果实的合理分配,更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成为解放战争前夕国共力量对比与战略格局演变的关键起点。

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受降权的研究已积累了一定的成果,主要聚焦于三方面:一是国际势力与受降权的关联,于化民剖析美国以“协助受降”为名支持国民党、介入国共冲突的具体举措,揭示美国对华政策对受降格局的影响^[1];周锦

涛、沈志华等则聚焦中苏关系,前者考察受降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2],后者在《中苏关系史纲》中梳理苏联对华政策摇摆对东北受降的制约^[3];汪朝光、周锦涛还从政权接收视角分析国民政府与苏联在东北的博弈^[4-5]。二是区域受降实践,张学继、刘晓堂等分别以第三战区浙江受降、第十二战区受降为个案,呈现地方层面多方势力的角逐^[6-7]。三是国共博弈的舆论与策略,张小满探讨重庆谈判前后国共舆论宣传战,展现受降权争夺的政治与舆论维度^[8]。现有研究已覆盖国际格局、区域实践与国共关系,但对中共在受降中整合各方力量的具体机制、不同战区受降的联动性等仍有拓展空间,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立足军事战略学与政治史交叉视角,通过分析中国共产党两个月光复195座城市、控制华北交通网络的实践路径,揭示中共如何以空间换时间,不仅扭转了军事被动局面,更通过掌控东北工业基地与华北交通线,为解放战争奠定战略纵深基础。

收稿日期:2025-09-28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湘鄂赣苏区文化建设研究”(CX20251030)

作者简介:徐方甜(1998—),女,浙江衢州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引用格式:徐方甜.抗战胜利后中共争取受降权的军事战略与战术实践[J].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7(6):32-42.

一 有权难用：中共面临的多维危机与主要困境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十四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终获胜利。然而,胜利的曙光并未带来和平稳定的政治格局,反而因美蒋势力的战略勾结,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一场关乎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作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虽在敌后建立了19块解放区、拥有120万正规军,却在战后受降权争夺与政治博弈中,遭遇美蒋联合构建的系统性压制。这种压制并非单一维度的对抗,而是以“法理否定受降合法性”“军事构建包围态势”“地缘封锁发展空间”为核心的多维危机,多重危机交织又形成指向明确的核心困境,即美蒋试图通过三重策略剥夺中共的抗战成果与政治博弈资本,将其压缩至战略边缘。本章即从多维危机的具体表现与核心困境的本质逻辑出发,剖析1945年战后中共面临的复杂局面与历史挑战。

(一)战后中共面临的多维危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美蒋势力联合构建的战略困境。这一困境以法理遏制、军事压迫与地缘封锁为核心维度,构成战后中共亟待解决的三重危机。

在法理上,美国为构建亲美政权以制衡苏联在远东的扩张,其对华政策为“支持国民党蒋介石统一中国”^{[9]690},并把受降权当作扶持国民党的政治砝码。1945年9月10日,《申报》公布日本向盟国投降的《降书九项内容》,其中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东三省除外)、台湾与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的日本全部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10]再加上杜鲁门命令麦克阿瑟督促日军固守阵地,“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11]72}。这就使得中共受降权在国际法理层面被否定。在国内,蒋介石政府在盟军一号命令发布之前就已经发布各项差别化命令。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急电何应钦,要求日军仅向指定军事长官投降^{[12]716}。次日又连发三道命令,严令中共军队“就地驻防待命”^[13],授权伪军“就地维持治安”^{[14]313},对国民党军则是“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

进,勿稍松懈。”^[13]8月18日,国民党划定16个受降区,唯独排除解放区。其差别对待的实质就是形成日伪和蒋军联合将中共排除在外的法理闭环,想在法理上彻底垄断抗战胜利的果实,从而阻止解放区的接收。10月,国民党凭借美援接收主要城市及日军装备。对此,陈毅后来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受降’和‘接收主权’为名,向中国人民、中国民主基地的解放区进攻。”^{[15]355}这就是在法理层面剥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

在军事上,中共面临美蒋联合构建的三重困境。首先是兵力部署失衡下的空间挤压危机。国民党凭借430万正规军与美械装备优势,实施南北夹击战略。自8月26日起,美军陆续向南京、上海、汉口、北平等枢纽城市输送国民党部队。9月7日,《申报》记载:“美空军今开始大批运送中国军队至华东区,此运输八万中国军队及其装备之空运,实为印缅区或中国战区空运规模最大及最复杂者,亦为历史上空运军队最大规模之一次。”^[16]美军这一行为使国民党在华东主要城市的军事控制权上形成绝对优势。10月31日,纽约广播称:“开往东北之第一批中国军队已乘美运输舰开抵秦皇岛。”^[17]这一消息更印证了美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已延伸至华北战场。自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将国民党政府军队14个军、41个师、8个交通警察总队约54万人,由大后方西南、西北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18]700}。进一步说明美国通过大规模海空运输支持国民党军队部署,加剧了中共在受降权争夺中面临的军事压力,是美蒋联合牵制中共的直接体现。其次是交通控制权丧失下的机动受限危机。1945年9月29日,蒋军数十师分经津浦、平汉、同蒲北进,美军已公布在秦皇岛、塘沽、天津、青岛登陆,助蒋争夺华北、东北。美国协助国民党控制华北交通动脉,使中共军队面临交通封锁,难以形成兵力协同。最后是日伪武装残留的直接军事威胁。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就授权伪军“就地维持治安”,使日伪武装成为压制中共的国民党辅助力量。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后,驻山东日军第43集团军以及伪军共20余万人,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纷纷向铁路沿线及城镇收缩集中^{[19]578}。华东地区鲁南申从周部、胶县王铁相等伪

军盘踞交通要道,东北地区残留的伪军同样拒绝向解放区缴械。中共虽拥有120万正规军,但装备上难以对阵美械装备,空间上解放区被分割包围,法理上受降权被系统性否定。“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20]1126}这种军事压迫本质是美蒋试图通过武装优势,将中共压缩至西北贫瘠地区,剥夺其战后政治博弈的资本。若不能打破这种军事封锁,不仅受降权无从谈起,甚至根据地也要面临被分割围歼的生存危机。

在地缘格局上,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承诺“给予中国的一切援助,包括政治、物质或精神等方面,均只针对中国中央政府”^{[21]63}。“如果我们有必要给予中国帮助的话,那么这种帮助一定是给蒋介石政府”^{[21]63}。但随着局势发展,苏联又对美蒋染指东北持警惕态度,斯大林明确表态:“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21]107}。这种矛盾态度,使中共在东北面临既无合法受降权、又无明确外援的双重不确定性。此外,南京受降后,中国战区划为16个受降区^{[22]259},分别接受各地区日军的投降。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均未划定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而国民党部队则是在美军协助下抢占平汉、津浦等铁路干线,这就使得中共控制的华北解放区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

(二)战后中共面临的主要困境

多维危机交织下,战后中共面临的主要困境,本质上是美蒋通过法理垄断、军事压制以及地缘封锁的策略闭环,构建起系统性边缘化中共的体系。这三重策略并非简单叠加,而是以联合国受降命令、蒋介石差别化命令否定中共受降权,为其军事行动铺垫“合法性”;借美军运输与美械优势实施兵力合围、交通封锁,将中共120万军队分割于19块解放区,再联合日伪武装压缩中共活动空间;最终通过切断中共向东北、华东等战略要地发展的通道,仅留西北贫瘠地区作为“战略死角”。这套环环相扣的策略,使中共在合法性认同、军事生存以及未来发展上全面被动,若不破局,将直接消解中共在抗战中积累的革命力量。

这一困境的现实后果,是中共面临“三重丧失风险”:丧失抗战成果的合法拥有权,十四年抗战

的贡献因法理否定难以被认同;丧失根据地的军事生存权,19块解放区面临被分割围歼的危机;丧失战后政治的发展博弈权,被排除在工业基地、经济中心之外,陷入力量停滞、被动挨打的循环。也正因如此,争取受降权成为中共破局的关键。这不仅是争夺接收日军装备的权利,更是通过打破法理垄断、突破军事封锁、获取地缘空间,捍卫自身革命成果、生存安全与政治博弈资格的必然选择。

二 谋定而动:中共在受降时期的军事战略布局

抗战胜利后,中共在美蒋联合压制与苏联政策摇摆的国际环境中,亟须突破法理、军事以及地缘上的三重封锁。本文主要研究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实施路径,探讨其如何通过兵力重组、政治军事协同及空间布局调整,在东北与南方形成攻防联动。从战略方针的确立到重庆谈判与军事斗争的辩证统一,再到东北与南方的差异化布局,中共构建的军事战略体系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独占受降权的企图,更奠定了自身从区域力量向全国性政党转型的基础。

(一)战略方针的确立:“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顶层设计

当国民党凭借美援大规模抢占城市与交通线时,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敏锐把握东北作为全国革命战略基础的重要价值,制定并推进“向北发展,向南防御”^{[23]26}的战略方针,成为影响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抉择。从战略背景来看,国际层面,苏联政策摇摆,美国则通过海空运输工具将国民党军运送到华南、华中、华北、东北内战前线^{[24]127},全力扶持国民党垄断受降权。国内层面,国民党排除解放区受降权,从西南调兵东北,企图以武力实现统一;中共则面临南方根据地被包围、北方解放区分散的双重压力。为此,刘少奇尖锐指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15]682},若不抢先控制,将“处处陷于被动”^{[15]683}的危局,战略调整刻不容缓。

战略构想始于1945年8月中共对东北的试探性布局,彼时山东军区调兵、晋察冀部队入承德,但“向北发展”与“向南防御”的战略方向争议尚未解决。9月14日,黄克诚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中央

军委发电,提出《对当前局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从战略全局高度,向党中央提出了向东北尽可能多派军队创造根据地等建议^{[25]222}。就在发报的同一天,刘少奇正在延安主持会议,研究派出中央机构加强东北工作问题。17日,刘少奇向前往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致电,首次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构想,并建议“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15]683}19日,毛泽东复电认可。当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将全国战略方针定名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刘少奇在会上强调,“现在问题就是快的问题,一刻千金”,必须以“全党全军的任务”确保东北与热察控制,即使面临“两头塌”风险,亦需“坚决行动”^{[26]483}。该会议通过三项关键决议:首先就是兵力的重组,山东军区需调6万兵力,其中3万赴东北、3万驻冀东,华东新四军调8万北撤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向苏南实施转移,苏南与皖南的主力则撤回江北;其次,在组织架构上成立由李富春、彭真分任书记的冀热辽中央局和东北局,林彪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最后在干部调配上,从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赴东北。10月上旬,林枫、张秀山率一千五百人的第一个大型干部团到东北^{[27]46}。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向北发展”是以十万大军闯关东为核心:山东军区6万部队经海运率先入辽,延安及华北部队陆路跟进,原南下的三五九旅余部掉头北进,控制热河及东北主要城市外围。“向南防御”则以收缩战线换取战略主动:新四军主力北撤山东,与山东军区合并为华东野战军;晋冀鲁豫军区通过上党战役、邯郸战役歼灭国民党军6.5万余人,巩固华北防线;南方各省则保留游击武装(如东江纵队),以分散战术牵制敌军。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决策与推进改变了国共力量的对比。到1945年底,东北人民军队总兵力发展到28万多人^{[24]113},依照中央战略部署,大批主力部队快速向北机动,成功抢占控制热察、进军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霸东北并对关内解放区实施南北夹攻的图谋;国民党则因兵力分散、战线过长以及接收腐败,民心流失加速。这一战略的提出,其核心在于准确把握历史机遇、果断进行

资源重组、高效实施组织动员,是中共在复杂国际国内形势下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典范。

(二)政治军事的协同:重庆谈判与军事斗争的辩证统一

重庆谈判与军事斗争的辩证统一,本质是中共在国共矛盾激化背景下形成的政治争取与军事自卫的有机整体。一方面,政治谈判是揭露国民党独裁本质、争取和平民主的法理战场。中共可以以《双十协定》为框架,将国民党置于破坏和平的舆论被动;另一方面,基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8]547}的重要论断,军事斗争是捍卫解放区权益、震慑强权逻辑的现实支撑。上党战役的胜利直接证明了军事对政治的支撑作用,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共解放区的存在。国共两党以和平建国为表象,以力量博弈为内核,形成谈中有打、打中有谈的闭环。谈判为军事行动赋予政治合法性,军事胜利为谈判筹码增加分量,二者共同服务于保存实力、争取民心的核心目标。

政治军事协同策略形成的动因在于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差距与国际博弈的双重驱动。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队数量占据明显优势,但其主力部署于西南,接收东北、华北依赖美国运输,形成权力真空期。中共利用这一窗口期,以军事行动扩大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在谈判中正视中共的军事存在。国际上,抗战胜利前后赫尔利公开声明扶蒋反共、不与中共合作^{[24]33},但也忌惮苏联介入;苏联虽然“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18]668},却也同意“在苏军未撤前,国民党军队不能在长春降落,中共可以作必要的布置。”^{[29]367}中共则精准把握美苏既对抗又妥协的心态,在谈判中援引国际舆论,又分别向美英苏提交说帖^[30],同时以军事控制热察冀地区威胁国民党接收进程,迫使美国为避免谈判破裂施压蒋介石。抗战后期国统区层层盘剥、物价飞涨、经济凋敝、民不聊生^{[31]254},当局政治腐败严重丧失民心;中共又以敌后抗战主力的形象赢得民意支持。在谈判过程中,中共将上党战役等军事胜利巧妙地转化为保卫人民果实的政治叙事,揭露国民党勾结日伪、垄断受降的行径,成功实现内战责任的舆论逆转,牢牢掌握了历史正当性与政治主导性。

政治军事协同策略的实施路径是军事支撑与谈判反哺的双向互动。军事斗争对谈判有三重支撑：其一，以战场的胜利划定谈判的红线。上党战役旗开得胜，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32]126}，堪称中共军事胜利支持政治谈判的经典范例。1945年9月，阎锡山部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不顾和平大局，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上党地区。中共军队果断反击，凭借卓越的军事指挥，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大量歼灭阎锡山部有生力量，直接迫使蒋介石在《双十协定》中承认解放区政权合法性。其二，以交通破袭迟滞敌军部署。9月17日，蒋介石命令四个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等分别率领所部沿铁路线向解放区进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开展交通破击战，打击沿铁路线进犯的国民党军，以求达到争取和平的目的^{[33]26}。随后，国民党军队沿着平汉、同蒲、正太、平绥、津浦五条铁路线进攻解放区。10月中旬，局势紧张，晋冀鲁豫地区的解放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在平汉路一带顽强阻击，迟滞国民党军沿铁路北上进程。至谈判结束，蒋介石仅运了五个军到山海关、两个军到华北、两个军到山东，其绝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华北的兵力仍然不足^{[34]677}。这也为中共争取到2个月的东北布防时间，形成了军事控制热察与谈判争取东北的联动。其三，以战斗的正义性强政治叙事。中共通过新华社播发通稿、《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党报全文刊载的方式，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内和平和民主而奋斗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35]460}；在前线开展高树勋运动，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同时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36]146}。并邀请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观战，其后来合作撰写出版的《中国的惊雷》一书写道：“一个统治集团没落的最后属性，便是它的抢掠、高压，和治国无方的能力。国民党之回到沿海一带恰恰证实了这一规律。”^{[37]354}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没落客观全面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38]36}，迫使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

政治谈判对军事斗争也形成三重战略反哺：其

一，以谈判争取军事行动合法性。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39]70}，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中共以周恩来为谈判代表在会中则提出军队国家化必定要和政治民主化同时进行，军队国家化的结果必须是军队属于全体人民，不能为哪一党控制^{[40]146}。将国民党整编中共军队的要求转化为国共军队平等整编的议题，为后续扩大解放军编制争取法理空间。其二，以谈判拖延争取军事部署时间。重庆谈判持续43天期间，中共中央调派11万军队、2万干部先机进入东北^{[24]76}，完成沈阳、长春等城市的接收准备；同时在南方完成新四军北撤，避免被国民党分割围歼。国民党误判了形势，未在谈判期间全力抢占热察，错失控制东北的最佳窗口期，导致其后续东北作战陷入被动。其三，以谈判分化国民党阵营。通过谈判接触国民党内民主人士，如冯玉祥、李济深，揭露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本质，促成国民党军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等先后起义。在民主党派中宣传和平建国纲领，争取民盟、九三学社等对中共军事自卫行动的认同，形成反内战统一战线。

此次重庆谈判与军事斗争的协同策略，其直接结果就是迫使国民党签订《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皆有平等合法地位”^[41]，为中共赢得3个月的和平建设时间。长远来看，打破了国民党独裁的企图，使联合政府的理念深入人心，奠定政治合法性基础；同时为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斗争只是政治斗争的继续”^{[42]366}策略提供范式，证明“军队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42]366}的马克思主义论断。重庆谈判与军事斗争的辩证统一，本质上是中共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复杂矛盾的典范。其核心在于：以军事力量遏制强权逻辑，以政治智慧拓展生存空间，以人民战争奠定胜利基础。这种谈打结合的策略，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应急响应，更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维的生动实践，为后世处理大国竞争、利益博弈提供了刚柔并济、攻防一体的方法论启示。正如毛泽东在谈判期间所言：“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

和平和民主。”^{[20]1160}这一论断,正是以人为本与辩证思维的最好体现。

(三)战略空间的拓展:东北与南方地区的攻防布局

抗战胜利后,国共围绕受降权展开激烈争夺,中共在复杂局势下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东北作为战略要地,成为“向北发展”的核心,通过军事调遣、生产建设与政权巩固,构建三位一体的根据地体系。南方则以“向南防御”为策略,通过兵力收缩、交通阻击与时间争取,为北方布局提供支撑。这一双向布局是中共应对时局的关键抉择,既着眼东北战略先机的抢占,又立足南方力量的保全与牵制,形成相互配合的战略态势。

在东北,中共以“向北发展”为核心,构建起军事、生产、政权三位一体的东北根据地体系。军事控制层面,毛泽东急电罗荣桓、李作鹏强调:“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36]82}因此,山东军区主力调走6万人^{[43]449},经渤海海运率先抵达辽东半岛。刘转连、晏福生带领留延安的三五九旅余部在南下途中奉命沿陆路穿越热河进入东北,开始抢占东北先机,控制热察。生产建设上,彭真在东北工作期间,十分注意发展军工生产。1945年,10月7日,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工作会议,提出要抓好兵工生产,“立即组织兵工厂,各单位按照自己的地区开始布置,做棉衣、出票子等”^{[29]474},并提出要建立领导兵工生产的部门。政权巩固方面,针对苏军正在撤出东北的形势,彭真于1946年1月14日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政权工作之紧急通知》,提出要以建立和掌控省、县临时参议会及各级政权为重点,通过“三三制”吸纳进步与中间分子增强基础;面对国民党接收时,坚持不轻易让出已得政权,以地方自治名义灵活应对,如国民党拒绝承认民选政府时,可采取软禁对方、迫使其撤离或解除其武装等方式坚守阵地,力争控制更多地区,迫使国民党谈判,从而巩固中共在相关区域的政权地位^{[44]113}。此后各地党委加强了对政权工作的领导,根据我党我军在东北开展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对东北行政区划作了调整,很快在东北各省区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

在南方,“向南防御”是公开进行的。这一布局

以收缩战线、集中力量、迟滞敌军为核心,为北方尤其是东北的战略布局争取时间。具体策略有三:一是主动收缩战线,集中兵力。把南方分散的部队往北边撤,比如从浙东、苏南、皖南这些长江以南的地方,退到苏北、皖东等江北地区,避免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原本在苏北、皖东的新四军主力则快速北上,调到山东,和山东的部队合在一起,由陈毅、饶漱石统一指挥^{[26]485}。山东原来的防务,就交给新四军在苏北、皖东留下的部队接手,确保防守不出现漏洞。这样一来,南方的兵力从分散变成集中,能形成拳头力量。二是依托交通线进行阻击。国民党军沿着津浦、平汉等铁路往北冲,想抢占东北。9月29日,中央军委指出:“必须迟滞蒋军行动,破坏和控制铁路、公路,是当前战略任务。”^{[23]27}1945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进行交通战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指示,重申“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23]27}南方部队就把重点放在破坏这些铁路上,组织民兵和小部队拆铁轨、炸桥梁、埋地雷,让国民党军的火车开不了,只能徒步走。主力部队则在铁路沿线用“纠缠扭打的战法”^{[23]27}在他们的前后左右实行袭扰,并寻求有利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有生力量。三是配合全局,争取时间。这套防御体系不只是被动防守,更重要的是帮助东北争取机会。由于南方部队把铁路都切断了,国民党军没法从陆路快速赶到东北,只能靠海运,速度慢很多。等他们到东北时,中共的部队已经在东北站稳脚跟。同时,南方部队在阻击过程中,也从分散的游击队变成了能打大仗的正规军,为后来的解放战争打下基础。简单来说,“向南防御”就是通过撤得巧、打得活、拖得住的策略,既保住了南方的力量,又为北方的战略布局赢得了关键时间,是一套灵活有效的防御策略。

三 主动出击:中共争取受降权的战术实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凭借美国支持和自身军事优势,通过控制主要城市及交通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施封锁、分割,以达到压制中共力量发展的战略企图。对此,中共则以战术创新突破实力差距。本章聚焦法理宣示与军事行动、城市攻坚与交通控制、非对称博弈与力量整合三组战术组

合,探讨中共如何将政权合法性转化为军事行动合法性,以坑道爆破、交通破袭等战术创新打破传统城防体系,并通过情报战、心理战等非对称手段弥补装备劣势。这些战术实践不仅服务于受降权争夺,更形成了一套适应敌后战场的作战体系。

(一)法理宣示与军事行动:从政权合法性到战场实践

在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后,中共将法理斗争与军事行动相结合,构建争取受降权的合法性基础。毛泽东《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与朱德七道命令构建了重要体系^{[45]555-558}。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苏联对日宣战后迅速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以政治宣言的形式确立中共全面反攻的合法性基础。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20]119}。这一判断既基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本关东军的毁灭性打击,也源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已建立大小18个抗日根据地的现实态势。从国际背景看,该声明发布于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关键时期,美国通过盟军一号命令将中国受降权专属授予蒋介石,苏联与国民党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8]667}。毛泽东在声明中特别强调:“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20]119},既呼应了《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法理框架,又巧妙地将中共武装的反攻行动纳入盟国对日作战体系,打破国民党正统受降的法理垄断。国内层面,到1945年9月,中共领导的主力部队已发展至12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达260万人^{[46]250},控制着全国25%的土地和人口,具备了展开战略反攻的实力基础。

紧随毛泽东的声明之后,朱德于1945年8月10日至11日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将抽象的关于受降权的法理诉求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指令。这组命令以《波茨坦宣言》为法理依据,系统规划了各解放区部队的受降任务:第一道延安总部命令,要求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附近日伪军送出通牒,限其缴械或反正,拒绝者坚决消灭,并全权接受敌占城镇交通要道;第二道和第六道命令,要求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及李运昌部,协

同朝鲜义勇队武亭部,配合苏联红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及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解放朝鲜人民;第三、四、五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部队向同蒲路、汾河流域、华北各铁路线及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进军,全权接受敌占城镇交通要道并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第七道命令则是要求解放区部队进入敌占城镇要塞后,实施包括军事戒严、控制设施、逮捕战犯、维持秩序等十项内容的军事管制^{[45]555-558}。七道命令的核心战略价值在于构建了受降权指向军事控制权的逻辑链条。例如,第四道命令明确要求山西部队向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所有敌伪据点展开进攻,“应克服一切困难,击破前进路上一切敌伪之阻碍。”^{[45]557}这种部署既针对日军仅向指定军事长官投降的指令^{[12]716},也回应了蒋介石8月11日发布的“中共军队驻防待命”的错误命令。朱德在命令中强调:“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45]556},正式将受降权的争夺转化为实际的军事行动。至日本正式投降时,七道命令成为中共武装展开战略反攻的行动纲领,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各解放区部队据此向被围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形成了法理宣示与军事行动的协同效应。

为打破国民党对受降权的垄断,中共展开了从国内政治到国际博弈的多层次法理斗争。8月14日,朱德首次通电蒋介石,尖锐地指出其“加紧作战”与“驻防待命”^[13]的双重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13],首次在公开场合揭露国民党借受降权排除异己的本质。16日,朱德进一步向美英苏三国提交说帖,从国际法理层面提出三项主张:其一,“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和抗日武装”;其二,“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武装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其三,“美国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30]。这一外交行动具有双重战略意义:在国际层面,说帖援引《联合国宪章》中“主权在民”原则,质疑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性,同时利用美苏在远东的矛盾,将受降权争议纳入国际政治博弈框架;在国内层面,说帖通过新华社、《解放日报》等媒体公开后,迅速引发民主党派与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要求国共平等受降

的社会思潮。17日,朱德再次通电蒋介石,明确提出分区受降的原则:“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应由解放区军队受降;蒋军则接受被蒋军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47],将受降权争议从军事层面提升至国家政治秩序重构的高度。

在法理宣示与军事行动的双重推动下,各解放区部队于1945年8月展开全面反攻。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修文车站、围困长治^[48],山东军区解放台儿庄、平度等75座城市^[49],华中新四军收复芜湖、扬中等地^[50],至1945年9月共光复城市166座^[51]。这一军事成果不仅扩大了解放区面积,更形成了从法理宣示到军事反攻的联动效应。通过控制华北、华东的中小城市,实际掌握这些区域的受降权,迫使国民党在《双十协定》中不得不承认解放区政权合法性问题需另行协商。从长远看,中共在受降权争夺中展现的法理斗争艺术,为此后解放战争时期以军事斗争捍卫政权合法性提供了历史范例。毛泽东的声明与朱德七道命令的配合,既体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真理,也展示了利用国际法理规则争取政治主动的战略智慧,为中共从区域政治力量向全国性政党转型奠定了法理与实力基础。

(二)城市攻坚与交通控制:空间争夺的战术组合

继先前所述的法理宣示与军事行动后,中共将城市攻坚作为落实“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的核心战术手段。以山东军区为例,罗荣桓依据朱德的七道命令,以鲁中、滨海、胶东、渤海、鲁南五路大军为主体,对胶济、津浦铁路沿线的日伪军据点展开系统性攻坚。至1945年8月,山东境内仍有日伪军20余万人盘踞济南、青岛、临沂等枢纽城市,构成以城制共的防御核心,城市攻坚作战也就成为打破此格局的关键。在具体战术实践中,临沂战役堪称攻坚模式的典范。临沂这座北屏蒙山、东傍沂河的重镇,是联系胶济、陇海两铁路的交通枢纽。日伪长期占据临沂,它一直是楔入“八路军鲁中、鲁南、滨海三战区中心的堡垒和扫荡解放区的军事集结地”^[52]⁸⁰²。1945年8月17日,我军鲁中第一路大军逼近临沂,与滨海第二路大军和军区特务团一起发动了临沂战役。但因临沂的高墙深壕、工事坚固以

及我方准备不够,临沂迟迟未能打下,罗荣桓急令前线“抓紧坑道作业,争取尽快打下临沂”^[53]³⁴³,改以坑道爆破为核心战术。9月10日,第二师四团埋设2000公斤炸药炸开城墙30米豁口,突击部队趁烟尘分三路冲入,经12小时巷战歼灭伪军2000余人,解放临沂并使鲁南、鲁中、滨海三区连成一片^[20]⁵⁹⁰。此役创建坑道爆破和步炮协同的模式,成为后续城市作战的范式。与临沂战役的爆破攻坚形成战术互补的是胶县战斗的夜间奇袭模式。1945年8月19日,前线指挥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率领第二路大军,北向胶济路东段、南向陇海路东段挺进。其中第一师以突击队夜间奇袭10分钟登城,全歼伪军2000人并切断胶济路东段^[52]⁸⁰³。而9月的平度战役则展现运动战与巷战结合的威力,胶东第三路大军许世友部采用多方向突破与巷战分割战术,生擒伪军长王铁相并俘敌5700余人^[52]⁸⁰⁵。这种城市攻坚与战术创新的实践,不仅打破了日伪军的城防体系,更直接为交通动脉的控制创造了战略支点。在此基础上,中共将战术重心延伸至交通网络的系统性封锁,通过控制胶济、津浦等铁路干线,构建起夺城、控路、制势的完整战略链条。

胶济路作为国民党军从青岛登陆后西进的关键通道,其控制权直接关系到美军协助运输的国民党军能否北上增援东北。在攻克临沂、胶县等城市的同时,中共以切断华北与华东联系为核心目标,对胶济铁路展开系统性分段控制。8月中旬开始,第一路大军第三、第四师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委罗舜初率领下,于19日攻克胶济路南的临朐城^[54],23日收复博山^[55]¹⁵⁶,摧毁日伪军在中段的据点群,切断胶济路中段的铁路运输。31日,第四路大军向胶济路西段沿线进攻,八路军突入邹平城、青城,全歼拒降伪军,胶济路西段被阻断。与此同时,第二路大军在陈士榘、唐亮率领下,攻克胶县,切断胶济路东段;第三路军在许世友、林浩率领下,先后攻克铁路沿线一些城镇,切断胶济铁路,使济南到青岛的铁路全线瘫痪,形成了对济南的钳击之势。继胶济路被控制后,津浦路作为国民党军从徐州北上华北的主干道,其控制权成为配合晋冀鲁豫军区阻断国民党北进计划的关键。10月13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和罗荣桓,指出:“目前山东与华中的中心任务

(除出兵东北外)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43]448},要求新四军以北移山东的主力与原山东军区部分主力,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成立津浦前线指挥部,由陈毅、黎玉负责。10月18日,陈毅指挥部正式发起津浦路徐济段战役。次日,山东军区第八师即攻占了津浦前线上的邹县县城,控制铁路20余公里,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山东军区第三、第四师占领了大汶口车站,控制铁路10余公里。从南北两处切断了津浦铁路^{[43]449}。此次行动阻滞了蒋军北上步伐,“使空运平津之蒋系两个军陷于孤立,亦将使海运入东北之两个军陷于孤立及被南北夹击之地位。”^{[56]773}

中共在华北、华中解放区实施的城市攻坚与交通控制形成显著战术成果。8月11日以后,两个月内解放区大军共光复敌占城市195座,生俘敌伪10多万^[57]。截至10月17日,山东通过临沂、胶县、平度等战役,共解放城市44座。在交通控制方面,五路大军分段控制胶济、津浦等铁路干线,使济南至青岛、天津至徐州的铁路运输全线瘫痪,迟滞国民党军北上步伐,为东北调兵争取到关键的窗口期。这些行动深度服务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一方面,通过临沂等城市解放,使鲁南、鲁中、滨海三区连成一片,构建起支援东北的后方基地;另一方面,胶济路、津浦路的封锁截断直接阻止了美军协助的国民党军海运北上。至此,中共通过夺城、控路、制势的战术逻辑,完成了从区域武装到全国性战略力量的转型:军事上,实现了从游击攻坚到正规交通战的跨越;政治上,以实际控制打破国民党法理受降的垄断;地缘上,构建起南控华北的战略纵深。这些实践不仅为辽沈战役等战略决战奠定基础,更印证了战略空间的拓展是军事策略落地的关键历史逻辑,成为中国革命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的重要转折点。

(三)非对称博弈与力量整合:特种战术的战略辅助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凭借美援、法理上的垄断受降权及正规军的优势对中共受降行动实施了多方面阻挠,而中共以自身力量的整合破局,形成一

种博弈态势。一方面,国民党通过四种手段构筑优势。一是发布差别化命令。1945年8月11日,蒋介石下达命令,要求中共军队原地“驻防待命”^{[20]1141},对其嫡系部队则是“积极推进,勿稍松懈”^{[20]1141}。剥夺了中共军队的受降权,为其阻挠中共受降提供了“合法”依据。二是抢占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积极抢占重要城市和交通线,与中共争夺受降的主动权。三是勾结日伪军共同对抗中共军队。如傅作义部勾结敌伪先后侵占我集宁、丰镇、兴和、尚义、武川、陶林、凉城、清水河等战略要地^{[58]20},给中共军队的受降工作带来极大阻碍。四是利用美军支持,增强自身优势。国民党利用美军运输兵力,抢占华北、华东受降区,获得大量日军装备,在受降过程中对中共形成更大压力。另一方面,中共以自身力量的整合来应对实力上的差距。军事上,1945年9月,晋冀鲁豫军区发起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部主力。10月,毛泽东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59]37}11月2日,战役获得完满胜利^{[60]791},成功阻击平汉路北犯之敌,挫败国民党封锁;伪军收编上,中共的策略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瓦解为辅。如鲁南大军8月歼灭拒降的申从周部,生擒申逆,同时通过政治攻势促使部分伪军反正,俘虏一千八百余人^[60];在区域控制上,通过胶济、津浦等铁路的破袭战阻滞了国民党军队的机动,为东北调兵争取时间上的窗口期。这种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武装补正规的整合逻辑,使中共从区域武装向战略力量转型。

在受降权利的争夺中,中共以情报战、心理战、破袭战等特种战术弥补实力差距,在战略层面形成对国民党的制衡效应。首先,在情报领域,中共情报网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已颇具规模且深入各方。在抗战后期及受降阶段,地下党组织充分发挥其隐蔽性与渗透性优势,成为获取国民党军关键情报的重要渠道。在东北,地下党已建立了情报工作系统,可以及时地掌握国民党军的动向,相机歼灭其小规模部队^{[25]233}。其次,心理战层面,采取军事打击配合政治瓦解的模式。对拒降的部队实施歼灭战,以军事威慑强化心理压力;对动摇的军队则通过反正宣传瓦解其战斗意志,使其主动投降。在这样的

策略影响下,1945年10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61]⁴⁹⁰。同月,国民党军新编十一旅旅长曹又参在陕西安边率部起义^[61]⁴⁹⁰,拔除了国民党军长期嵌入陕甘宁边区北部的一个反共据点。这些起义的发生,正是中共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策略协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最后,交通破袭战术也很关键。8月至9月,山东军区五路大军通过破坏胶济、津浦等铁路干线,使济南到青岛的铁路全线瘫痪,同时从南北两处切断了津浦铁路,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北上的步伐。这些特种战术构建了这种非对称博弈下破局的策略:以情报优势弥补装备劣势,以伪军策反削弱敌方力量,以交通破袭阻滞敌军机动。至1945年10月,中共通过该战术体系控制华北、华东主要铁路线,迟滞了国民党军队北上,为东北根据地建设奠定交通与兵力基础,验证了特种战术辅助战略全局的战争逻辑。

四 结语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受降权争夺,是中共军事战略与战术实践实现系统性突破的关键时期。面对美蒋联合构建的法理封锁、军事压制与地缘围堵,中共以“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为总纲,通过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协同、空间布局的攻防联动、战术体系的创新突破,构建起完整的应对框架。两个月内光复195座城市、控制胶济与津浦铁路干线的实践,不仅打破了国民党独占受降权的企图,更完成了从游击武装到正规兵团的转型,为解放战争奠定了战略纵深与力量基础。

这一时期的探索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战略层面,“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决策精准把握了东北作为战略枢纽的核心价值,通过10万大军北上与南方兵力收缩的资源重组,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的转变,印证了把握主要矛盾、聚焦战略重心的全局思维。战术层面,法理宣示与军事行动的协同、交通控制与城市争夺的配合,形成了以法理立据、以战术落地的实践路径,为复杂博弈中的策略制定提供了范本。组织层面,山东军区主力的快速海运、2万名干部的跨区调配,展现了中共强大的

动员能力与执行效率,证明战略落地离不开高效的组织体系支撑。

从历史影响看,受降权争夺中的战略战术创新,不仅直接推动中共掌控东北工业基地与华北交通线,更塑造了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军事传统。既有“向北发展”的战略定力,又有“坑道爆破”“交通破袭”的战术弹性;既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硬核逻辑,又善用“说帖外交”“舆论宣传”的软实力。这些经验不仅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支撑,更为新时代应对复杂安全挑战、实现战略目标提供了兼具历史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

- [1]于化民.对日受降权争端背景下的中共与美关系[J].史学月刊,2011(12):64-78.
- [2]周锦涛.对日受降时期中共与苏联关系考察[J].历史研究,2018(6):91-104+189-190.
- [3]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
- [4]汪朝光.进退之间的博弈:战后东北苏军撤离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6):91-101+156.
- [5]周锦涛.战后政权接收视域下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71-81.
- [6]张学继.抗战胜利后第三战区在浙江的“洽降”与“受降”[J].浙江学刊,2017(5):219-224.
- [7]刘晓堂,刘静静.多方博弈:第十二战区的受降研究[J].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3):101-108+141-142.
- [8]张小满.论重庆谈判前后国共双方的舆论宣传[J].史学月刊,2001(6):93-98.
- [9]沙健孙.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10]降书九项内容[N].申报,1945-09-10(2).
- [11]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M].李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
-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0.
- [13]朱彭总副司令通电:坚决拒绝蒋介石错误命令[N].解放日报,1945-08-14(1).
- [14]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6]最大规模空运,昨开始实现[N].申报,1945-09-07(1).

- [17]首批国军抵秦皇岛,即将开赴营口登陆[N].华北日报,1945-11-01(1).
-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2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1]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
- [22]王建朗.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2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史稿:第四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4]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五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25]黄克诚.黄克诚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6]金冲及.刘少奇传1898—1969: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27]《彭真传》编写组,田酉如.彭真主持东北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9]《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一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 [30]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N].解放日报,1945-08-16(1).
- [31]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32]李德生.李德生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册[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34]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35]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3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37]白修德,贾安娜.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中国的惊雷[M].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 [38]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讲故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9]曲青山,柴方国.中国共产党100年口述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40]马东玉.梁漱溟传[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3.
- [41]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N].新华日报,1945-10-12(2).
- [42]陈毅.陈毅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 [43]刘树发.陈毅年谱: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4]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5]朱德.朱德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 [46]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四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47]朱总司令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制止内战[N].解放日报,1945-08-17(1).
- [48]绥远我军攻占陶林、毕克齐[N].解放日报,1945-08-17(1).
- [49]我军光复张家口[N].新华日报,1945-08-30(2).
- [50]华中各路我军告捷[N].解放日报,1945-08-18(1).
- [51]解放区战场连年血战,光复城市一六六座[N].新华日报,1945-09-01(3).
- [52]张文杰,郭辉.八路军抗战纪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53]李维民,潘天嘉.罗荣桓在山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4]我克静海进迫天津[N].新华日报,1945-09-03(3).
- [55]中央档案馆.中国受降档案:上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7]解放区人民大军英勇战绩,两月光复二百城[N].新华日报,1945-10-17(2).
- [58]李新,彭明,孙思白,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60]鲁南申逆从周部拒绝投降,我军予以全部歼灭[N].解放日报,1945-08-14(1).
- [61]《习仲勋文选》编委会.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王 涛】